

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

张西平

[摘要] 汉语国际传播在全球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对其中做出宏观的战略思考。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应在以往语言内部研究的基础上走向语言外部,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当下快速发展的汉语国际传播事业。

[关键词] 汉语;国际传播;战略思考;汉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1)02-0009-05

[收稿日期] 2011-01-18

[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亚非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近代中西语言交流史,世界汉语教育史。(北京 100089)

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设立,汉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传播。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极大地加快了汉语海外传播的速度,扩大了汉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给汉语海外传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许多都是语言战略问题,或者是必须从语言战略角度加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语言传播战略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一个崭新而又重大的问题,成为该领域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国家和平崛起战略中的汉语国际传播

和平崛起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大中国的软实力,充分利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魅力。无疑,汉语国际传播是扩大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汉语国际传播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我们应将汉语的国际传播列入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之中,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高度,全面调整汉语国际传播的政策和方针。

当我们将孔子学院的运作形式作为国家软实力来考虑时,我们就要研究国家软实力的特点,研究作为软实力的孔子学院的运作形式是如何软起来的,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有什么关系,如何和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实力相配合,等等。国家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利益是始终要放在首位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全球利益和战略部署,仅仅将孔子学院作为教育部门的事来做,就会对孔子学院的战略使命认识不清。如果对文化传播的特点和一个国家运用软实力的方式不能认真、周密和成熟地考虑,仅凭一种政治热情来做,其结果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对国家长期的战略利益的负面影响最终会显现出来。

当我们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来考虑汉语国际传播时,我们就要研究文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就要对那种过度依靠行政手段来传播汉语的做法和政策进行反思。应真正从文化软实力的特点出发,来规划语言的发展和传播。如何在语言传播中按照语言文化规律与特点开展工作?如何巧妙运用行政力量?如何在语言文化传播中表现行政力量?这些都应依孔子学院运作的经验和教训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

将汉语国际传播列入国家战略之中,作为提高和加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需要国家给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更大的支持,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资金上给予资助,在学术研究上给予支持。应该说,孔子学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成绩面前,我们应该积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广泛征求学界的意见,这样,才能使这项伟大的、前无古人的事业更为健康地发展。

二、探索一种和平、平等的语言传播模式

当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时,我们就不再将我们的目光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和对外汉语教法的问题上,尽管这些问题仍是我们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李宇明先生所指出的“研究语言传播是语言学等学科的天然职责,但以往的学术精力集中在第二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对语言传播的宏观规律关注较少,认识有限。”^[1]一旦汉语大规模地走向世界,我们发现中国尚缺乏在全球如此大规模传播自己文化和语言的历史和经验。我们开始关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语言传播经验,但发达国家的语言外向传播是和其殖民历史紧密相连的,是和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连在一起的。直到今天,英语等西方国家的语言传播仍然隐含着这种倾向。上世纪60年代,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制定重要的教育规划时往往不注重本土语言,他们直接套用殖民地模式,青睐欧洲语言,在大部分的“援助”项目中只采用英语,从而脱离了第三世界学习者所面对的多语言现实和文化的独特性。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一种西方语言和西方教育原理的依赖与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依赖密切相关,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导致富裕的西方国家势力加强,会带来贫穷国家的经济、文化甚至语言上的落后局面,西方依然处在决定原料价格以及语言规范性的大国地位。”^[2]⁷¹⁵①他们将此称为“语言主义”。

西方强势语言的外向传播和传播经验并非十全十美。他们的不少经验在技术层面值得我们学习,但在文化立场上值得我们反思。作为一个后现代化的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特点确定我们的语言国际传播政策,仍是我们研究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在汉语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得到传播,中国的国际形象得以改善,但我们从未有“汉语中心主义”。语言是平等的,如同文化和国家的平等一样。回顾新中国建国之前的百年中国英语教育史,期间的辛酸泪是不堪回首的,因为那时的英语教育并不仅仅是知识和语言的学习,同时还是对西方国家文化的认同,对中国文化的冷淡,对自己文化立场的动摇与模糊。今天,在传播汉语时,我们没有西方国家在传播语言中所包含的为“橙色革命”培养力量的野心^[3],我们所展现的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伟大中国,所坚持的是和平、平等的语言传播观。所以,在学习西方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经验时,必须看到这样的经验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对于中国当下的语言传播理论的构建的价值是有限的。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也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认真梳理总结“西方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和经验”,是我们汉语外向传播和传播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②在实践中总结中华民族自己的和平、平等的语言传播经验,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重要使命。

三、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语言传播政策研究

语言传播政策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描写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体、语言结构,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语言,而是兼顾言语,提倡联系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语言,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语言是如何运用的”^[4]。语言政策是对语言和政治关系的研究,“语言政策的形成必须考虑到语言对个体、族群、民族、社会及国家的意义,其中也涉及认同的概念。”^[5]它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部分。一般来说,语言政策研究大都主要关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国家共同语和各民族语言的关系,使语言规划更加合理。其实,国家之间也存在语言政策的协调问题。比如欧盟,在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联合体中,也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各个民族国家间的语言问题。^[6]

语言的外向传播涉及语言间的关系及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传播语言和接受语言之间的关系,这绝不是语言学本身能够解决的。我们从日语的传播史中可以看到,在日本对东亚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整个语言传播和传播政策的目的是“把亚洲人民教育成日本帝国的臣民,政治家的野心是想

① 这个观点很值得中国教育部门的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特别是英语学习政策的制定者注意。书中还说“当一种语言,比如英语,比另一种语言,比如尼日利亚语或肯尼亚语,获得较多资源和权利时,从结构上,这种语言的权势必削弱他种语言的功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这种‘语言主义’给欠发达民族和社会造成了不少灾难性后果”(《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第715页),今天中国的全社会学英语,各种职称及技术级别的晋升都考英语的做法值得深思。

② 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西方国家已经连续召开了多次“国际第二语言问题研讨会”,并展开了“世界第二语言调查”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

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把日语传播为通用语言。”^{[2]678} 日语的传播和其国家政策紧密相连。因此,政治、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多方面问题都应成为语言传播政策研究的内容。

调查研究是一切政策决策的前提,这是汉语国际传播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为做好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教育情况的调查,应尽快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对汉语在海外传播的基本情况做系统调查,对重大政策问题做深入的理论研究,使我们的决策机构能够随时动态了解在全球范围内汉语对外传播的基本情况,从而使汉语传播政策的制定更为及时与合理。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2010年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委托项目,建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将把汉语国际传播的基本数据收集作为其重要任务。2006年该中心与商务印书馆、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中心召开了首届中国语言战略发展研讨会。2011年他们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世界汉语教育史丛刊》,对汉语在全球的发展展开历史性研究,该中心应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努力,为丰富和完善中国的语言传播政策尽力。

要了解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政策。国家财力和人力有限,对外汉语传播不能平面展开,而应根据国家利益和不同的地区特点有重点地展开,对全球汉语教育应有一个基本的设计和规划。要做到这两点,需要深入研究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政策。因文化和政治情况不同,各国与中国的国家关系也不同,针对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汉语传播政策,我们应作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与分析,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这是我们制定汉语国际传播政策的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已经开始了这项政策研究,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显得不够。这方面英语和法语传播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在对外汉语学术研究领域,今后应加强社会语言学研究,加强语言传播政策研究。领导机关的学术咨询应注意吸收社会语言学家、语言政策学家参加。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学术视野不断开拓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知识不断丰富过程,这样,我们的汉语传播事业方能顺利发展。

在调查各国的汉语政策时,我们还应开展国别汉语学习史研究。开展对外汉语史研究、国外汉语学习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对外汉语界在学术上的重大提升,以往我们对这个问题只是从学科发展和建设上考虑。事实证明,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对汉语的国际传播有直接影响。这项研究和海外汉学史研究紧密相连,无论从基础研究还是从政策研究角度考量,这都是一个亟待发展的方向和领域。^①

四、积极与海外汉学界互动,为汉语走向世界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认识海外汉学家这个群体?如何与海外汉学界展开良性的互动?这是一个关系到汉语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过去,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此认识不一,一些人认为,我们只做汉语教学,不做汉学研究,没有必要和国内外汉学家打交道。现在更多的人则认为,不重视海外汉学家的做法是不利于汉语向世界传播的,加强与海外汉学家的互动是我们做好汉语传播的一个重要工作。这种认识的转变非常重要,因为汉语国际传播的最主要支持者是海外汉学家。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汉语海外传播就会产生困难。团结和帮助汉学家将是汉语国际传播的一项长期政策。

将海外汉学研究作为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对外汉学教学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即便不将海外汉学研究列入其学科范围^②,也应从国家和民族事业的视角,支持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只有系统研究了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现状、汉学家的基本情况,我们在海外各国的汉语传播才能找到真正的合作者,使我们展开的国别和地区的汉语政策研究拥有人力上的支持。所有到海外从事汉语教学的中国本土教学人员均应具备“海外汉学(中国学)史”的修养,应将“海外汉学史”作为对外汉语本科专业阶段或研究生专业阶段的基本课程,所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员应基本了解海外汉学的历史和现状,以便他们在海外从事汉语传播时更好地和汉学家展开合作^③。

① 这一问题的研究请参阅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大百科出版社,2003)、程裕真主编《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张西平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商务印书馆,2010)、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1期)等相关研究成果。

②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术领域,很难将其归在某一固定学科之中。

③ 当然,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此,它对中国学术的发展,甚至对中国国家的安全都有这重要的意义。

做好海外汉学家的工作,对现行孔子学院计划有重要意义。有了汉学家的支持,我们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就有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目前我们的孔子学院计划如何和海外汉学家展开互动,如何利用汉学家这批资源尚待深入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15年,15年来接待近2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对各国的汉学史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主办的《国际汉学》是该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辑刊。

五、加强对海外孔子学院运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近年来,对外汉语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据统计:2003年,美国有200所中小学校开设中文课,2006年增长3倍;2004年,中国派出69个对外汉语教师,2006年应需求派出1000名志愿者和1000名教师;2005年,海外有近3万人参加汉语考试,2006年翻了一番。^[7]截至2009年底,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已达4 000万,^[8]截至2010年10月,已经在全球96个国家(地区)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①面对这样的形势,学术界应有更为冷静的思考,为快速发展的汉语教学提供理论和学术支持。笔者认为有四个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第一,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全局出发,精心布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战略发展的一部分,中国经济正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世界性的发展。孔子学院设置应该围绕国家和平发展这个总战略进行布局。为国家在全球的发展服务,为国家在全球的利益服务,应是设立孔子学院的基本出发点。在孔子学院的建点问题上,应更多从国家整体布局和国家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而不能仅仅将对方的要求和需要作为设立的主要动因。这样,就需要我们真正了解国家在全球的战略和利益。从迅速发展精心布局,这是孔子学院从初级到高级发展的重要转变,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

第二,进行功利性语言推广。在目前孔子学院建立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定的市场运作方式和手段,以便使孔子学院发展的费用达到良性循环。我们应该像美国托福那样精心设计我们的市场化计划。应考虑孔子学院运作过程中的市场运作和市场机制的范围和限度,也就是说,在多大范围内运用市场化原则,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化原则。作为软实力形式的孔子学院,其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孔子学院是展示中国悠久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窗口,是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桥梁,各国朋友通过在孔子学院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能够了解中国。经济盈利从来不是追求的目标。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反其道而行之,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孔子学院作为软实力形式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原则。

第三,借助孔子形象,做好文化推广。一位外国记者在谈到孔子学院时曾说过,选择“孔子学院”这一精心挑选的名称正好表示了北京希望提升软实力的雄心,也不会使人联想到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大教育家的孔子也代表着和平、和谐。和平与和谐是中国目前一直宣称的价值观,中国希望以此来消除别的国家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担忧。这个评论说明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品牌,已经获得国际上的认可,以“孔子”作为学院的名字,说明我们已经开始较好地理解了软实力的特点。但我们必须看到,从事孔子学院工作的基本队伍大多数来自国内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师。他们对孔子学院所承担的文化功能认识并不很清楚,他们大多数人也不具备运用孔子学院展开文化外交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能力。孔子学院是“立足语言教学,而不局限于语言教学”,这是由它的软实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对孔子学院的这个特点的认识还远远不到位。“立足语言,侧重文化,通过语言传播文化”,这是孔子学院的重要工作方针。我们应由此出发,制定孔子学院的师资培养计划及其他工作计划。

第四,孔子学院需要考虑探索更为成熟的运作形式。在推广自己国家的语言方面,西方国家有着更为成熟的经验。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的文化委员会等等,共同的成熟经验是“国家支持,民间运作”,特别是美国富布赖特基金会的运作十分典型。1946年美国通过了《富布赖特法案》,利用销售美国作战剩余物资所得,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这个法案暗含的原理是,任何通过运用富布赖特基金会而获得学术成果的人士,都要感谢富布赖特,感谢美国,从而在心理上对美国亲近。1961年美国又通过了《互相教育与文化交流法案》和《富布赖特-海斯法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汉办官方网站,详见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案》,正如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所说,这两项立法“将国际教育和交流重建为官方外交关系的公共领域。”显然,这是一种国家行为,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富布赖特采取了民间基金会形式,其运作就有更大的回旋空间,行为把握也更富有弹性。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设计我们的孔子学院运作形式,使其运作更为圆润,活动空间更为广阔,机制更富有活力和弹性,为中国软实力的发展提供更为成熟的经验。

李宇明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语言,随着中国的发展加快了向外传播的步伐,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早成为外语教育的最大国度。但是,我国处理现代语言传播的经验十分不足,理性思考也相当欠缺。全面观察语言传播现象,深入探讨语言传播规律,按照语言规律做好语言传播规划,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容忽视、不敢懈怠的社会课题。”^{[1]3}

六、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

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国家汉办2006年提出的对外汉语要实行的六大转变,汉语国际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同时,快速发展的汉语国际传播形势也对我们原有学科的设计提出了问题。以往那种以教学法研究为主的思路显然跟不上当前的发展,从对外汉语到国际汉语教育将是我们这个领域最重大的转变。如何适应这样的转变,最主要的是在学科建设上重新规划,开辟新的学科教学课程。这些都需要学者重新思考。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探索语言传播规律//[C]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 第3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 [2] 周庆生主编.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 [3] 王建勤.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对策//[C]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 第2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
- [4] 游汝杰, 邹嘉彦. 社会语言学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2.
- [5] 蔡芬芳. 比利时语言政策[M]. 台湾前卫出版社, 2002: 100.
- [6] 丁元亨. 欧洲整合与欧洲语言政策[M]. 台湾前卫出版社, 2002: 13.
- [7] 赵国臣. 孔子学院与汉语国际推广//[C]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 第1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3.
- [8] 吴晶. 海外约4000万人在学习汉语,“汉语热”需好教材[EB/OL]. (2009-12-14) [2010-10-02].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12/14/content_12644187.htm.

【责任编辑: 李开拓】

Some Strategic Thoughts on Chinese Language Are Facing in the World

ZHANG Xi-ping

(Overseas Si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Chinese language has achieved rapid glob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has proposed some macro-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ing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main idea is to develop the research of social linguistic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f language, and look again the rapidly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of Chinese teaching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spread; Strategic thoughts; Sinology research